



世纪文库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目录学史 / 姚名达撰.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4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5325-3909-1

I. 中... II. 姚... III. 目录学史—中国 IV.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01715号

责任编辑 李志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撰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2
插 页 5
字 数 306 000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909-1/K · 651
定 价 40.00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前 言

民初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目录学是其中之一。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民国丛书》编撰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周谷城教授发言说，民初是可以与春秋战国媲美的第二个学术思想“百家争鸣”时代。此话以及周谷老浓重的湖湘乡音，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后来《民国丛书》出版了，收入第一编的目录学著作就是姚名达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三种。

姚氏目录学著作三种之中，《目录学》是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的一种，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所以对于目录的任何方面都简略地讲到了。”（《目录学·自序》）《中国目录学年表》一书，系采用传统史学的年表体式，截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的零星史事，依时代先后，逐件系年，汇为一编。作者曾打算把《年表》作为一个篇章合入《中国目录学史》，取名《通纪篇》，置《溯源篇》后，使读者在具悉中国目录学渊源之后，先知全史梗概，然后逐篇研究，以免支离灭裂之弊。但事后发现此篇字数数万，条数数千，每条各占一行，篇幅几与史文全部相等，殊有枝大于干之嫌，才又重新抽出，独立成书，恢复原名，单行问世。因为《目录学》是初学入门之

书,《中国目录学年表》为资料汇编,故相比之下,唯《中国目录学史》属于原创性专科学术史著作,最符合《蓬莱阁丛书》“尤具开创性”的选辑标准。不过单就史料的丰富和通贯而言,《年表》对读者了解中国目录学史还是很有帮助的。正如作者所说:“此篇悉属原料,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考订排比,费事最多。书成自观,殊觉乏味。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年代及其过程,则舍是莫由;苟能一气读毕,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亦可隐约得一概念;专家用作参考,必可免翻检之烦;且读各主题篇时,必有随手比照,增加领略之功。”(《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以是之故,建议读者如读毕此书意兴犹存,不妨再把《中国目录学年表》浏览一过。

—

据我知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与传统的、具有一定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与同时代的、兼有目录学史内容的著作相比,则以纯专科学术史研究而迥然有别。谓之开创,未为过也。

晚清革制,朝廷派员出洋考察,学习先进,最先效法并比较见实绩的,大概要算是西方的学校和图书馆了。随着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西洋现代目录学思想理论也很快传入,治图书目录学者,除少数仍固守传统外,大都能抱接受和吸收的态度,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看姚名达《目录学》一书的篇章名目,全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建构的阐述模式,可见这位出身清华园的年轻学者对外来新学的积极态度。再看《中国目录学史》,开卷即先解释目录、目录学的概念和定义,目录学的种类和范围,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也颇具现代学科理论建设的气象,但其篇目结构却与悉仿西学的《目录学》不尽相同,有

点“中西合璧”的味道。

《中国目录学史》结构以“篇”为主题，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各篇每节，但立标题，不标序数。全书凡十篇，依次为：《叙论篇》、《溯源篇》、《分类篇》、《体质篇》、《校雠篇》、《史志篇》、《宗教目录篇》、《专科学目录篇》、《特种目录篇》、《结论篇》。如果算上后来抽出单独成书的《通纪篇》，就该是十一篇。显然，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比如清末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民初蒋元卿的《校雠学史》等。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这种方法称作“主题分述法”，并解释其义说，就是“特取若干主题，通古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馀”（《叙论篇》）。

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去组织中国目录学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发展进程中的“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硬要划分时期，区别特点，“强立名义，反觉辞费”（《叙论篇》）。这样解释或许还有点儿费解，那就让我们参见姚氏《目录学》第二卷第七章“目录学的趋势”里的一段话。他说：“中国过去的目录学，造端于刘歆《七略》，发扬于两晋南北朝，收萎于清季，复兴于今日；但其形态仍不能跳出《四库》的范围外。再可以说一句，自刘歆创《七略》后，虽有郑樵、章学诚等加以精讨，但其范围，只是平面的发展，并没有直线的进步。换言之，自西汉至今日，虽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而目录学一科，仍就是在一个圈子内打走围，正如同其他学术一样没有进步。”由此可知，姚氏所谓“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仍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断代法”来编写（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但我们对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需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于，用“特取若干主题，通古而直述”的方法，是否能够，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源流毕具，一览无馀”呢？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

不足，他说：“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至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利弊相权，怎么处理？姚名达的理念是：“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具体对策是：“依史事之所宜，采多样之体制”（《叙论篇》）。就是说，《中国目录学史》各篇将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史法体制，而不强求一律。理解这一点，就比较容易读懂《中国目录学史》“主题分述法”框架结构的理论含义了。

《叙论》、《结论》两篇各居首尾，在全书结构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叙论篇》首先对“目录”、“目录学”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作了分类，在——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提纲挈领，宣示宗旨，很符合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规范。《结论篇》以极短篇幅，分别阐述他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其目录学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

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结构的主体。第一《溯源篇》，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设立这个主题，完全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录》、《略》虽然开创了目录工作和目录体制、分类的基本模式，但也导致了二千年来目录学没有重大突破和飞跃进步。传统目录学既受其庇护，又长期笼罩在它的阴影中。所以率先引领，以为其下各篇主题之根本。该篇除详述《录》、《略》分类、编目特点外，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以至插架，莫不一一推寻原始，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其叙事阐释方式，与其他各篇以主题为纲领的笔法不同，作者自称是“混合叙述”、“追问法”。

《溯源篇》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通古贯今，看似“独立特行”，互不相干，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结构暗合。如原来设

置在《溯源篇》之下的《通纪篇》，姚氏即明确说是“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叙论篇》），后来无奈抽去，纪传体制便缺了“本纪”一角。现在紧接《溯源篇》之后的是《分类》、《体质》二篇。为什么？因为姚氏认为，“分类与编目为目录学之两大巨轮，故首及之”（《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并设定其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志”。为什么是“志”不是“传”？因为这二篇的主题“分类”和“体质”（编目），乃古代目录制度结构最本质的两大要素，性质与其他以目录类型为主题的各篇不同，故其论述方法也不同：“皆所以勘同析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叙论篇》）《分类篇》讲图书分类法，上自《七略》，下至杜威，尽录古今目录分类之纲要，并论其要旨，评析得失。《体质篇》讲编目的方式方法，因以著录、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为“构成目录的质料”，以活页、辞典、类书、年表、散文等为“目录构成之体式”，故改以“体质”为篇名。众所周知，“志”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分类》、《体质》二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故效其书法，可谓形质兼具。姚氏认为这两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必亦于此求之。”（《叙论篇》）其中《分类篇》“探讨最深，分析最精”，作者自觉比较满意。《体质篇》则“搜集未广，论证未详”，作者自我批评“最陋劣”。但读者不要因此轻忽此篇，其实里面还是有不少启发人思之处的。

由于《分类》、《体质》二篇都是根据古今公私藏书综合目录的演变来叙述的，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具特质的目录则无暇顾及。如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与一般书目大相异趣的宗教目录，与综合性目录相对应的学术专科目录，以及那些“性质特别而不限于一科”的目录，等等。所以作者又另作归纳分类，按“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立题名篇，各各阐述。若以《通纪篇》之为“纪”，《分类篇》、《体质篇》之为“志”相推拟，那么这几篇的性

质、体例，似正可视为纪传体之“传”。《史志篇》以时代为主，凡正史国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后世补志，莫不加以评鹭；《宗教目录篇》以佛教目录为重点，兼及道教目录、基督教目录；《专科学目篇》对经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文字、教育、科技、艺术等学科的目录与索引，逐一叙述，溯古详今；《特种目录篇》“取为数较多者”，分列丛书、个人著作、地方著作、禁书、刻书、阙书、版本、善本、敦煌写本、举要、解题、辨伪十二门类，并兼及有关妇女著作、家族著作、学派著作、日报要闻、杂志论文、参考书、书评、外国人书籍的目录和索引。这与纪传体史书以儒林、文学、循吏、佞臣等分门别类为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些貌合神似吗？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构想，借鉴传统历史编纂法，使“主题分述”以致结构割裂的负面影响得以消弥。所以我说《中国目录学史》结构框架有那么点“中西合璧”的味道。

篇目结构中唯《校讎篇》似稍嫌突兀。此“校讎”盖指广义的整理，而非狭义之校勘。为什么要设立此篇？因为姚氏觉得目录乃由校讎而来，“校讎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讎之果”，“总目录之成，多先经校讎之手续”，“史志之成，莫不据秘阁之校讎”，二者呈因果先后关系，而《分类篇》、《体质篇》仅按总目录的形态特质来叙述分类、编目的演变，没有涉及“前因后果”，所以要另以“校讎”立题设篇，“以述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但以我之陋见，目录之学固然由校讎而来，若谓之密不可分，那也只是维系在朝廷秘阁藏书这一层面上。如作者所说：“古之书籍，未经校讎，难于著录，故两事相因，不易分辨。中世以藏书为炫耀，秘府往往抄写旧书为一律之体式，校勘整理俱所不免，写定之后，亦有目录。近世私家善读书者，则广勘众本，考定异同，择善而从，蔚成专科之学。藏者不必能校，校者不必自藏，目录学之与校讎学（校勘），遂截然两途矣。”（《校讎篇》）秘阁校书既与官书总目录相因，写目录学史当然不能不顾，但二者既已截然分途，叙述亦宜以目录为纲，与其为“校讎”谋篇，不如为“公私藏书总

目录”立“传”，凡“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都附系于各重要秘府书目下逐一铺展。这样，既照顾了目录学与校雠学的这层关系，又避免了理论框架上的结构“错位”，同时也可使目录之“本传”更显丰满。

《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框架决非无懈可击，但确有创意。姚名达《自序》提及此事亦颇为自许，说：“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在我看来，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

二

早在《民国丛书》出版之前的1957年，《中国目录学史》就已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重印。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再版《后记》中说：“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印它，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作为最好。”这是很有权威的评价。姚著于文献资料广采博搜，读者随手翻检，即可领略，自不必于兹赘言。至于编写内容，作者《自序》尝称“书中论断多出心裁”，并“姑举数端，聊示一斑”。若《别录》无辑略，《诗经》、《尚书》属丛书，《隋志》分类乃《七略》、《七录》嫡裔，佛经《旧录》、《别录》即支敏度《经论都录》、《别录》；若目录必兼有解题和引得，丛书必须拆散归类，文集宜改入总类，等等。今亦就读书所得，略举数端。

首先说说“解题”。姚名达虽然为中国目录学写下洋洋洒洒的通史，但他对古代目录学成就并不推崇，总体评价甚至较低，认为“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质疑“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

未成功”（《叙论篇》）。独有“解题”得到他不吝其词地赞赏，说是传统目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唯一优于西洋目录的地方。

重视解题的作用、意义，《中国目录学史》并非开先之作。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提出“篇目”、“叙录”、“小序”为传统目录体制三大要素；且以“解题”取代“叙录”，区别目录种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并强调解题于目录之学术性尤见重要：“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轻重；即有解题，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目录学发微》虽迟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但余嘉锡从1930年起即持为讲义，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翻印传抄，习者众多。他的“目录体制”学说，旋为后来目录学著作承袭沿用，视同经典。如1931年出版的刘纪泽《目录学概论》，论体制、派别，就已一本其说；姚名达《目录学》“目录的派别”一节亦同其说，该书出版于1933年。不过，余嘉锡论述解题只在原原本本推寻叙录体例的本原，对其发展衍衍出来的各种变例无一阐发，而这在《中国目录学史》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

书中论解题者仅三四处，篇幅也都不大，但其见解、论断颇有新意，并多能切中肯綮，发人思考。比如他提出目录分类应从多方面着眼，若“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做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叙论篇》）。又比如他在区分目录体制时撇开“小序”，突出“解题”和“书目著录”，打破了余氏按“篇目”、“叙录”、“小序”三要素区分目录的框樊。这是从宋元以后目录实际出发重新树立的区划标准，很有道理，大有必要。因为事实上有小序的书目只占很小比例，特别是宋元以后，罕见“有小序而解题者”，唯多“有解题而无小序者”，再按余氏标准类分，根本行不通。另外，清以来书目著录变化很大，书名、著者名、卷数及其他参

考项，大大超出原初“篇目”的内涵，再固守余氏标准，根本管不住。所以后来有人就按有无解题分作两大类，但还不及姚氏合理，因为确实还有“兼书目及解题”者，比如清代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遗憾的是，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后世治目录学者的充分重视。

书中又正式提出“解题目录”这一概念，并予以体例、内容上的分类和分派。说自刘向《别录》出，“遂开后世解题一派，然目录未必有解题，解题亦未必皆同体例。刘向《别录》所开之风气，后世有完全接受者，有撮取精华者，有偏举局部者”（《体质篇》）。又说“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则有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异，又或兼而有之”（《叙论篇》）。所谓“完全接受者”，是指能对《别录》体例“皆一一详论”的目录，如刘宋殷淳《四部序录》、唐元行冲《群书四录》、北宋《崇文总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撮取精华者”，指“各方面皆已论到，而又不如《别录》之详尽”一类，如刘歆《七略》、唐毋煚《古今书录》、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偏举局部”包括二方面意思：一是指那些“精神时有所偏，不能每书皆逐一研究其各方面，体例不能纯洁”的目录，如刘宋王俭《七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高儒《百川书志》等；二是指那些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发展的目录，如清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百宋一廬书录》、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特别注重版本方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备录成说以备考证之例”，等等。

此外，《特种目录篇》还专设“解题目录”一节，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讲古代的解题目录。说“解题”之名始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陈、晁二志“详略略等”，与《七略》、《七志》“同一系统”，与《四部序录》、《古今书录》、《百川书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皆相附而成流派”。说解题目录就是《别录》体制的“撮取精华”一派和“偏举局部”一派，较之《别录》及其“完全接受者”，

“则具体而微”；“较之一般有目无叙录者，则增出‘解题’之语”。这与《体质篇》说法小有差异，不知是后来的改变还是本来的疏忽。二是讲现代的解题目录。说古代解题“皆典藏目录”，与现代解题的概念不一样，“现代之解题实即读书指南，非复古义矣”。并举吕思勉《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为例，介绍其体例内容特点。

总之，《中国目录学史》论“解题”，文字不多，篇幅不长，观点未必完全正确，论述也不够周详严密，但却富有学术上的创意和挑战性。我们尽可不必苟同，却不能无视或轻视。可惜其中不少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争辩讨论。学术欠长进，回头再看，竟然新意犹在。

其次谈谈《宗教目录篇》，主要是其中的佛经目录，着重看作者治目录学史的方法。

《宗教目录篇》是文字最多的一篇，几占全书四分之一。从整体看，确实有些失衡，反过来说，当然最为详尽。尤其讲佛经目录，在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著述中，似尚无出其右者，欲知佛录史，此书甚宜。不过对此篇感兴趣的不会多，读者往往匆匆翻过，草草了事，我初读就这样，基本上没看。但是，如果看佛录只在求知佛门经籍，那么没兴趣的不读也罢，若是为了通览中国目录学史，不读就缺了一大块。为什么？因为佛经目录在学术方法上有不同并转胜于一般目录的地方。姚名达说：“晋宋四部目录初亦兼收佛经，《七志》、《七录》且特为佛经、道经新增二录。而后来帐籍终于分道扬镳，不相为谋。正统派之目录学家既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拒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立门目，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著录成目，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特以其书深隐丛林，故不甚为流俗所重。”（《宗教目录篇》）他在《目录学》第三章“佛经目录”中还说这样说：“目录学史中，最值得我们佩服的乃是佛经目录。它所用的方法，比普通目录优胜的，至少有五点：一、历史观念很发达，每一部书的传译渊源、译人

小传、译书时间、译书地点，都记载得详详细细。二、辨别真伪很严格，凡是可以怀疑的书，都仔细考证，明白辨别。三、比较异同很详审，一部书有数种译本的，都详细列举，比较它们的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部，或在一部书里抽译一二篇，而另题书名的，都一一根究它的出处，分别注明，使得学者不致迷惑。四、搜采遗逸很勤劳，虽是已佚的书，亦必保存它的名目，以候采访，使得学者可以按照某时代的目录而知道那部书是何时遗佚了。五、分类极复杂而很周备，或照著译时代分，或照书的性质分；性质里面，或照书的涵义内容分，例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乘’‘小乘’，或照书的形式分，例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同一目录中，各种分类并用，同是一书，而依它类别的不同，交错互见，常常数十次，使得学者便于检查。假如读者不信，请一看僧佑、法经、长房、道宣诸僧的作品，便不能不鄙薄《七略》、《汉志》、《新簿》、《七录》实在太简单，而且不能不叹惜此后各种目录太没长进了。”这样的结论虽说未必恰如其分，然而治目录学者确实不能对佛录的分类、体制一无所知，即使他并无兴趣。

《宗教目录篇》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目录、佛教目录和道教目录三部分，而于佛录历史之论述，用力最深，不仅是材料的搜辑，更在于方法的运用。作者《自序》在追述此书编撰缘起时说：“其始原欲博收精考，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年代先后叙成系统，佛教目录即其残迹。著作过半，始知其规模太大，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亟毁已成之稿，改用主题分篇之法，撷取大纲，混合编制，几经改造，遂为今式。”由此可知什么才是作者最初构建目录学史的理想方式。所以我们除了需要理解此书整体框架，还应该了解佛教目录部分的结构和学理。那是怎样的叙史方法呢？显然就是上文说的“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年代先后叙成系统”，即以成书年代为经，具体佛录文献为纬，来编织历史的方法，所谓“文献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凭空托大之弊，能臻实事求是之真。很多学科专史都适用此